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五二期 ——
(二〇〇五年八月三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8f)

【当事者说】那年奉命寻李讷	邢志远
【学术争鸣】解读金春明教授关于“文革”的定义	武振荣
【一家之言】“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	金春明
【难忘岁月】《风雨人生路》摘载(之九)	刘文忠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当事者说】

那年奉命寻李讷

• 邢志远 •

“文革”前，我是《解放军报》驻广州军区记者组的一员，1966年夏秋，报社既要出版，又要搞运动，人力紧张，就把驻外地各军区的记者调回北京集中使用。我们组四个人先后到了报社，就在北京市军内外执行采访任务。

◇ 事情开始 莫名其妙

那是1966年10月间，一天傍晚，记者处副处长宋琼问我：“你有便衣没有？”我说：“有一件蓝色中山装上衣。”

“那好！你快到摄影组去，请他们给你拍一张一寸半身便衣照，马上把照片给我！”我跑到摄影组，穿上便衣，请他们照相。摄影组同志问：“你照这相片做什么？”

我说：“我也不知道！”

他说：“你们记者尽执行神秘任务！”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

事实确实如此，当时的“中央文革”常常指派解放军报记者做一些调查。这些任务都是通过解放军报代理总编辑胡痴、记者处副处长宋琼分派记者去干的，记者之间互不通气，谁也不知道别人干什么，报社其他同志更不了解。

至于我自己这次要干什么，我也还不知道。

◇ 任务到来 我从梦中惊醒

我把照片交给宋琼，就回自己的临时宿舍休息。大约到次日凌晨三点钟，宋琼派人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叫我换上便衣到他办公室。

我进他的房间一看，宋琼对面坐着一位个头高大、戴黑眼镜的30多岁的人。

和我同时进来的，还有记者处内勤组的女同志金秀芳。她也穿着便衣。

一见我二人来到，宋琼便向我俩介绍说：“这是戚本禹同志！”

戚本禹！我吃了一惊。

对于此人，“文革”前我毫无所闻。“文革”开始后，他一跃而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再在报刊上发表批判文章，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出头露面，名字不断出现在大小报纸上，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突然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明星。那时我对他是十分仰慕，但难得一见。如今他竟坐在我的面前，我马上肃然起敬，还有些手足无措。

我远远地站着，笑着向他点头，我不敢靠前，也没有伸手同他握手。

戚本禹一点也不讲客套，他不同我寒暄，只看了我一眼，就对宋琼说：“年龄大了，大了！”

我莫名其妙，仍旧笑着站着。宋琼解释说：“在我们的记者当中，他算比较年轻的，而且比较有经验。”

他看到戚本禹频频点头，就转身对我和金秀芳说：“你们俩随戚本禹同志去天津一趟，具体执行什么任务，由戚本禹同志向你们交待，你们听戚本禹同志指挥！”

说着分别递给我和金秀芳各一本证件。我接过一看，是北京大学学生证，上面贴着我的便装照片。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戚本禹说我“年龄大了”，那年我已36岁，装扮一个大学生，显然是年龄过大。

◇ 直到上路 我才知道要干什么

我和金秀芳随戚本禹坐上他的小汽车离开报社，向东开去。车到西长安街，东方的天色已经发白。

戚本禹告诉司机：“到北京饭店停一下，咱们吃点早餐。”戚本禹的司机似乎很熟悉，他带领我们进了饭店旧楼下一个小餐厅，大概是汽车司机吃饭的地方。戚本禹点了饭菜，四个人默默地吃起来。

我心中纳闷，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呢？金秀芳没有外出采访过，这次为什么要带她出来？

吃完饭，戚本禹打发司机去结账，他开口向我们交待任务了：“老人家有个小女儿，是江青同志唯一的亲骨肉，你们知道不？”

“知道，是不是叫李讷的那位？”我回答道。

“你见过她？”

“没见过！”

这时金秀芳笑嘻嘻地插话了：“我见过她的照片，前几个月，宋副处长给我一张她的小照片，叫我给她办一张解放军报记者证。我给她办了，可没有见过她。”

戚本禹说：“对了，就是她！现在她离家出走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本来她想到外地去串连，江青同志不放心，不允许她出去，不料她不辞而别，好多天无音讯。老人家很着急，她是老人家最喜欢最疼爱的孩子！”

我恍然大悟似的插嘴说：“我们到天津去找她？”

戚本禹说：“就是！她从天津来了一封信，说她在天津。这次我们到天津找到她，先劝她回来。如果她不想回来，你们二位就跟着她，她到那里你们就跟她到那里，陪伴她，照料她，要保护她的安全。”

原来如此！我和金秀芳毫不犹豫，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好！坚决完成任务。”

当时我们二人都没有想到这个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更没有想到这件事责任无比重大，都很高兴也很荣幸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事实上也不容我们多考虑，我们都是革命军人，习惯于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还是共产党员，金秀芳也在争取入党，对于如此光荣而重大的直接为伟大领袖服务的任务，难道还能说二话吗？

◇ 寻找过程 相当费周折

车子向天津开去，戚本禹和金秀芳坐在后排，我坐前排司机旁边。

路上，戚向我们介绍李讷的情况，说她是北大历史系毕业，如今在中央文革工作；说她生活非常俭朴，不讲究穿，不讲究吃，像普通干部的子侄等等。

戚也询问我的情况，我告诉他我是山东半岛人，什么时候参军入党，参加过哪些战役，什么时候当记者，等等。

我也反问他的情况，他回答比较简要，原来他是山东威海人，和我可算大同乡；而且他也36岁，和我同龄。

车到天津市中心，大约上午8点钟。

戚本禹叫司机把车开离大街，找到一条僻静的街道，在一个中学的门口停下。

他叫我们在外面等着，自己进了学校。

这条街和这个学校叫什么名字，我早已忘记了，只记得行人甚少，比较冷清。

大约过了20分钟，戚本禹从学校里走出来，满脸的不高兴和失望，对我们说：“她写信没说实话，她根本不在这里，这里已经没有外地来串连的人了。”

他转身对司机说：“到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很热闹，校园内人来人往，有住在校内的外地的学生，还有本市来看大字报的人，大字报的碎片、传单和垃圾遍地都是。

◇ 在南开大学 我们也碰了钉子

我们找到学校的接待站，自称是北京大学的，来这里找人，请他们把接待登记簿拿出来。那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向我们要证件看，他打量我们一番然后说：“你们北大的老师也出来串连啦？”

他显然不认为我们是学生，而是把我们当成讲师和助教了。

冒充学生，我们3人的年龄和形像，明显是不合适的。

接待登记簿一大堆，我们3个人动手翻阅，主要查看近十来天的。戚本禹告诉我二人：“她叫李小江，就找李小江！”

我们一本一本地翻，一行一行地查，一个姓名一个姓名地看，查了一个多钟头，看得头晕眼花，就是没有查到“李小江”。

戚本禹大概也累了，提出到外地女学生住的地方去看看。

我们走进女宿舍，有的就是课堂改成的，看到不少外地来串连的女学生，但看不到我们要找的人。所有的宿舍都很肮脏，空气污浊，臭烘烘的，很难想像我们要找的人就住在这里。

◇ 茫茫人海 寻找谈何容易

中午，我们在一间小饭馆吃饭。我忍不住地说：“既然她会改名字，又不写明住地，天津这么大，学校这么多，我们这样毫无线索地找，像大海里捞针一样……。”

不等我话说完，戚本禹就哈哈一笑插断说：“你是不是说，应当取消我们这次任务？”我连忙解释：“我不是说不再找，但这样找很难有结果……。”戚大概也觉得我的话有道理，就不再说什么。

下午，我们继续跑了一两所高等院校，校名我记不清了。反正进了学校先找接待站，翻阅接待登记簿。也不知查阅了多少本，都没有发现“李小江”。只在一个学校的登记本上，发现了一名“李小香”，也是位女性，但年龄和其他项目都不对，而且人早已离开，不知到哪里去了。眼看着找不到人，戚本禹又交给我们一项任务，要收集各种传单。

天色已经很晚了，街上的路灯亮起来，行人越来越少。戚本禹说：“咱们找个部队给北京挂个电话吧！”

我长期驻广州军区，对天津驻军情况不熟。这时金秀芳说：“找66军军部吧！”金秀芳长期在北京工作，知道一些驻天津部队的情形。

我们找到66军军部值班室。值班干部见我们三位穿便衣的人闯进来，开始神色有些紧张和戒备，后来见我和金秀芳掏出解放军记者证和工作证，就变得相当客气。戚本禹也有证件，还不止一个，我只看到他有一本《光明日报》记者证，上写姓名为“向东君”。

◇ 直接通话 接电话人是江青

这时他什么证件也没有拿出来，全靠我和值班军人交涉。我说要向北京打电话，值班军人同意了，戚本禹就拿起了电话。我已记不得他怎么要的电话，不久就接通了他要找的人，头一句话他就说：“她骗了我们，她写的通讯处是假的……。”

他把在天津活动一天的情况给对方讲了，我当然不知道对方讲了些什么。戚放下电话对我们说：“走，咱们回北京！”

我忍不住问戚：“你跟谁通的电话？”

他说：“跟她妈妈！”

她妈妈？她妈妈不就是“敬爱的江青同志”吗？戚本禹跟江青讲话怎么这样随便和放肆呢？

我有点不相信，便傻乎乎地问：“是她妈妈本人吗？”

“是她本人！”

我们辞别那位怔怔地瞧着我们三个不速之客、有些莫名其妙的值班干部，出了66军军部大门就往北京奔。

在车上，戚本禹突然说了一句：“她妈妈叫我带着她、管着她，我一个人哪里管得了！以后交给你们胡痴管去！”车在京津公路上开，我们三人都不停地打瞌睡。

◇ 任务结束 一趟任务徒劳无功

回到北京，已经过了半夜12点。

戚本禹把我二人送到平安里3号解放军报社大门口，说声“再见”就走了。此后，除了在几次大会上远远看到他坐在主席台上，我再没有接触过他。1968年初，他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我更是无缘同他“再见”。

回到报社，按照记者处领导的规定，我没有向别人讲过我的天津之行，报社绝大多数人也不知道我去过天津。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完。

金秀芳同志从天津回来后，宋琼副处长又派她同两位刚从部队调来的年轻力壮的记者一道，再一次外出找李讷。他们3人从北京到上海，又从上海到杭州，还是没有找到，只好无功而返。这是以后金秀芳告诉我的。我想这必是江青坚持要派人去找。至于为什么要到上海和杭州找，金秀芳没有说，我也没有问。因为有纪律，我不便多问，金秀芳同志也不便多说。

现在有些报刊文章说，李讷是1965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的；还有的说，李讷在“文革”外出串连，一度同家中断了联系，江青下令派人寻找，最后由《解放军报》记者在上海找了回来。

事实真相是她自己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她父母身边。她真正到《解放军报》工作，是1966年11月、12月之间。

◇ 不期而遇 她竟然到军报来工作了

11、12月之间的一天，我外出采访回来，我的直接上级、报社驻广州军区记者组长杨子才同志，突然找我说：“你上次到天津找的那位同志，现在到报社当记者来了！她如今的姓名叫肖力，你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千万不能说出去，要保密。”

惊奇之余，我很快找到肖力同志所在的办公室，远远望去，只见她身穿新军装，白净面孔，端庄大方，脸的轮廓像她爸爸，戴着白框眼镜，眉眼有些像她妈妈。

原来她是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高兴。能和伟大领袖的亲人在一个单位工作，我们是多么幸福呀！

以后我经常同她见面。我们都住在报社办公大楼的五楼，那是筒子楼，住在斜对面，可以说是朝夕相见。但因上级没有安排我同她合作采访，我就没有主动找她谈什么。每次相逢，只点头微笑而已。不知谁告诉她，我曾到天津找过她，有一次她正吃炒花生，就随手抓一把塞给我，以表示谢意。

我顺便问她：那次你跑到哪里去了？

她说：“我爬泰山去了。”

接着又说：“这次外出，对我锻炼很大，要自己找车坐，自己找住处，什么事都要自己干，长了很多见识。”

当时我听了很感动。她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拒绝养尊处优，真不愧是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优秀女儿。我想起了社会上流传的毛主席给李讷的题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李讷同志正是按照伟大领袖的教导认真实践的，她一定会成长为堪当大任的坚强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 长期保密 这在当时办不到

可是，她在报社要长期保密是办不到的。

“文革”以来，报社有的记者如杨子才等人上天安门城楼采访，见过她在伟大领袖身边，有的摄影记者还为她父女拍过合影；同时，她自己要长期隐姓埋名，也是不可能的。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变化，她身不由己，到报社不满两个月，就挺身而出，自我揭开了庐山真面目。1967年1月13日，她组织了“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了题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带头一举把胡痴、宋琼以及杨子才等人揪了出来，“开创了解放军报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

由她领导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左右了军报的运动，同时，她担任军报版面组组长（后担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执掌军报编辑出版大权。从我奉命寻找“北大学生”李讷，到李讷掌握军报大权，时间不到两个月。当然，几年之后，李讷同志离开了军报，又经过若干年，胡痴、宋琼等人都获得了“解放”和平反，杨子才九十年代初期还当了《解放军报》总编辑。这都是后话。

同时，随着“文革”的发展，我对许多事情和人物的看法也逐步深化。我庆幸那一次到天津没有找到李讷，没有执行那个神秘而又神圣的使命。如果在天津找到了她，并陪伴她到各地去串连，以后的遭遇真是难以设想。倘若在路上有一星半点差池，出点什么闪失，我如何说得清？以后想到这一点，想到那个担子的千钧之重，我很是后怕，甚至有些不寒而栗！至于那本北京大学学生证，我曾经保存了几年，却一直没有拿出来用过，后来把它毁掉了。现在我很后悔。我虽然不是货真价实的北京大学学生，但那本学生证却是真的，上盖北京大学的钢印，无疑是当时在北京大学掌权的聂元梓那派人奉“中央文革”之命给办的，至少可以作为一件“文物”保存下来，以纪念我那次不平常的天津之行。

~~~~~

## 【学术争鸣】

### 解读金春明教授关于“文革”的定义

• 武振荣 •

#### 1、一个别出心裁的“文化大革命”定义

在中国大陆那几个很有名气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专家学者中，金春明教授是我认为的很有个性的一个人，他写作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以下简称《史稿》）我在中国的时候就阅读过，虽然对书的内容没进行过仔细的研究，但是，对书中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定义却产生出了强烈的印象，以至于在阅读之后，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感觉。那时候，我本来就想针对此写一点东西，只是因俗务缠绕没有动笔。2002年11月，我在韩国逃亡后，苦于没有中文书籍可读，经四处打听，于去年底终于在汉城寻找到一家小小的中文图书馆，想不到竟然在其中寻找到《史稿》一书，又一次地翻阅之后，就想到要写一点类似于读后感的文章，拖了半年，这才动笔。

在《史稿》中，作者对“文化大革命”下了一个十分冗长的、在我看来也是别出心裁的定义，为了使读者们能够和我一同分析它，我把它全文摘抄如下：在列举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主要的特征之后，他用一个商量的口气提出了“可否给‘文化大革命’下一个更为具体的定义”的问题，几经踌躇，定义作出了：“‘文化大革命’是由最高领袖亲自和领导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以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为对象的，采取所谓‘四大’方法动员亿万群众参加的，以反修、防修巩固红色江山为神圣目标的，一场矛盾错综复杂的大规模、长时间的特殊政治运动。”

上述定义如此之冗长，读者们读后如果产生了它好象它不是定义的感觉，那就是有心之人。的确，我和大家的感觉是一样的，以为这个定义如此“特殊”可能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于是，就产生了我所使用的“别出心裁”的词。这个定义是陈述性的，句字如此之长好象表明了作者在执笔时有不得已而为之的隐衷。谁都知道，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从一出世来，就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准说”，一个部分“不准说”。所以从事“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人，如果分不清这两个部分，那他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副统帅”——林彪所说的“糊涂虫”，“脑袋掉了还不知怎么掉的”。我猜想金春明教授的定义好象是立足于“准说”的那一部分内容之上，而又牵连起了或者暗示了那个“不准说”的另一部分潜在的内容，从而使他的定义具有了我们中国学术的“微言大义”的特征。正因为如此，我就有理由认为：这个世界上最蹩脚的“文化大革命”定义却是中国社会能够公开作出来的最好的定义。我们大家不都是明白“社会主义”有一个“中国特色”吗？那么，在学术上它也是有一个“中国特色”的，只不过中国学者们因羞于这种“特色”而对其保持沉默罢了。

## 2、定义中的问题

在上述的定义中，金教授用有意地作了6个方面的陈述，但是，这样的陈述他好象没有给“文化大革命”作出定性的意图，只是用一个“特殊”的词对之作了个修饰，以至于他提出了6个“特殊”的结论是：“1是领导特殊”；“2是理论特殊”；“3是对象特殊”；“4是方法特殊”；“5是目标特殊”；“6矛盾特殊”，有了这“6个特殊”，他就有理由说，“文化大革命”“可以简称为特殊的政治运动”。我认为，金教授的这个定义其所以十分的微妙就在于他对“特殊”一词的使用，因此对于那些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革命”或者“动乱”的人来说似乎都可以接受它。因此即使你把它解释成带有引号的革命（毛泽东的“革命”不带引号）或者带有引号的动乱（邓小平的“动乱”也不带引号），好象都能够说通。至于说到“特殊”之下所隐藏的内容是什么？那就可以发人深省了。

在中国，一个有思想的人在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时候，特别是所表达的思想和一个官方的口径有一定的距离的时候，那么他就得特别的小心。在一个缺乏基本的思想自由的社会中，一个学者在表述自己的意见与思想时就不得不遵守某些“基本原则”，如果说这样的遵守行为也可以辟出一个学者自己多少享有的狭隘的自由空间的话，就一定得讲究个技巧的问题，而金教授的“文革”定义就是一个“技巧”极高的定义。这个定义非但没有抹杀此书发表时的官方定义中的矛盾，而且是把这些矛盾都一一地列举在定义之中，从而给出已经由官方两次所下的“文革”定义（一次是毛泽东所下的“革命”的定义，一次是邓小平所下的“动乱”定义）以疑义。也就是说，在它的定义中，不仅质疑了毛泽东的“革命论”，而且也质疑了邓小平的“动乱论”，但是他却把质疑后的自己的东西给隐蔽起来了。也正是这样，我就猜想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是不是和我有些近似？我在研究“文化大革命”时主张四个字：“出毛去邓”。所谓的“出毛”，就是研究者一定要能够主动地走出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理论”的那种骗局，若不是这样的话，你就会把“7亿人的运动”拱手让于毛；于此相应的是，所谓的“去邓”就是你在后毛泽东时代又得打破或者除去邓小平的“动乱论”，若不是这样的话，你就认不清楚民主在过去时间中的形象，因此，你也就不可能认识未来时间上的民主，你就会有出现了民主的地方以为“发生了动乱”，对比之下，金教授的定义，既有“出毛”之意，又有“去邓”之心。

定义一般是涉及被定义的东西的性质，因此，通过定义人们就可以轻而易举的了解事物的性质，但是，金教授的定义却帮不了你的忙，你通过这个定义寻找不到“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在我们中国，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曾经作出了如下三个方面的说明：一、人民群众运动；二、毛泽东运动；三、共产党运动，但是，这三个已经被说明过的东西在金教授的定义中是被质疑的对象，你说他是人民群众的运动为什么又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你说它是毛泽东的运动，你却寻找不到毛泽东政治领导的方法、途径和路线？也不能够解释一场毛泽东的运动怎么能够接纳“7亿人”的事情？你说它是共产党运动吧，哪儿有共产党当权派全部被打倒，普通共产党员都纷纷地跳出了共产党组织变成了政治造反派的事情呢？正因为被研究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真实的存在着上述现象，所以研究它时所使用的定义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因此，只要我们接受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特殊的政治运动”的定义，那么，你不妨在“特殊”二字上去大做文章。你做出来的文章与金教授所欲言而嗫嚅的意思也许相近似。如果，你在美国、英国、法国或者韩国当教授，你肯定不会遇到如此使你狼狈的问题，但是，你是在中国大学当教授，你吃的那碗饭是与你做学问的技巧有关，金教授其所以在吃紧的问题上做学问而又没有失去所执之教鞭，原因也在于他掌握着别人所不及的写作技巧。

## 3、对毛泽东“革命论”的质疑

美国已故汉学家费正清在论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说了如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惊人性”和“规模、影响与复杂性，”“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值得世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情况即使这样，在研究“文化大革命”方面，我们中国人却从来都不是这样，在前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没有任何疑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要强迫人民接受；后毛泽东时代，它又被当成一场“社会大动乱”要人们来认可，因此，在这近40年的时间中，“文化大革命”不是作为一个“研究”性的事物存在的，而是作为一个被中国社会的最大当权派认定的既定事物而存在的。因此，连费先生所说的“研究”都谈不上，何况“世代”的“研究”？

但是，如果由此而推论这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没有丝毫的变化，也不是事实，的确也发生了某些的变化，前几年总算是出来了一个遮遮掩掩的“文革学”，金教授的《史稿》是其中的扛鼎之作。这也就是说一个不允许研究的问题，竟然是有了研究的开端。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果把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的研究当成为一个对普通事物的研究，那难免会生出疑问，因为“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不但是作为一个政治运动而且也事实上被作成了“文化”（可以说是大众文化），于是，所有研究它的人都无不是在面对一个现成的“文化”。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史无前例”的运动有着“政治”和“文化”的双重存在意义，既是一场“人民群众的政治运动”，也同时是一个“大众”品牌的“文化”。情况既然是这样，双重存在的东西却都因印着一个木刻版的毛泽东则面头像而归之于毛。在前毛泽东时代，它作为毛泽东的“伟大建树”被认为是一个“里程碑”；在后毛泽东时代，它又作为“晚年毛泽东的重大错误”而被认为是共产党政权的最大“失误”。总之一句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金春明教授的“文化大革命”定义好象是要打破上述的局面，他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的“领导”提出了质疑：“‘文化大革命’中最时髦的口号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似乎10年中每一个重大活动都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因而紧跟这种部署当时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尚。但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不仅当时没有人知道，而且至今尚未研究清楚。”表面上看，“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巨手”一挥，亿万人民群众都跟着动了，但是，这个可以用卡通画表现的场面在我们这个所谓的“读图时代”却有着许许多多的未曾解读出来的内容呢。如果说毛挥“巨手”的“文化大革命”图画同普通卡通画一样，有着毛“制作”的嫌疑的话，那么，破解毛“制作”的意图，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史稿》中，金教授虽然没有全面展开“破解”工作，但是他对运动所作的定义以及对毛的“战略部署”“没有人知道”的说明，已经是尽了在专制条件下作学问的最大的本分了。

如果说毛对运动的“领导”是一个可以质疑的问题，那么，运动到底归谁领导的问题就应当有一个新的答案，虽然金教授对新答案不置一词，但是他已经为这样的研究答案留下了余地。因此当我们在研究毛是如何“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首先得弄清楚毛是通过谁？什么组织？还是什么机构来实施“领导”？在“文化大革命”前，说毛“领导政治运动”，那是货真价实的，他通过由共产党的各级组织系统实现其“领导”，这些组织有中央局、省、市党委、地、县党委直至基层的党支部。文件是一级一级下发，指示是一级一级的传达，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党的机构和系统统统地被“造反”的人民给打倒了，甚至可以说连一个基层的党支部也没有剩下，这样毛泽东唯一能够“指挥”就是数以千万计“造反派组织。”但是，凡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知道“造反派组织”是一些在人的偏好的基础上成立的自治的组织，这些组织没有一个是正式注册的社会团体，是一些真正的随着成员的偏好而波动的有的甚至是朝生暮死谁也无法对其实施有效控制的组织，这些组织不但没有和毛发生任何的政治隶属关系，而且它们在各地都是以分裂的、对立的形式存在着，因此即使这样的组织愿意接受毛的“一元化”的领导，其组织结构的“多元化”性质也抵制它，使毛的“领导”归于无效。

我告诉读者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基层红卫兵造反派的“小头目”，我检查我和我的组织同毛的关系之后发现它完全是一种“宗教”的关系而没有任何的政治性质，这就是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仅仅是在“精神”上才是毛的“兵”，而在政治上，我们却是自己的“兵”，除了我们在“精神”上愿意“服从毛”外，在政治上，我们是完全“自由”的。用英国哲学家密尔的话说：“服从远方的君主，就是自由”。用中国的俗语说：“天高皇帝远！”在金教授的书中，虽然没有直接说到这样的意思，但是他对毛的政治“领导”——在一般看来这是铁板定钉的事情——所提出的质疑，已经为我的上述意思的介入准备了空间。

#### 4、对“动乱论”的非议

在我上面提到的大陆的“文革学”中，金教授的著作对“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社会大动乱”的邓小平的论调提出了公开的非议，是我读到的类似作品中的最有分量的一种，特别是在他为“文革”下的定义中，对已经由中共中央作出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是“一场社会的大动乱”的结论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表现出了作者非凡的胆量和勇气，是学院派“文革研究专家”中一位佼佼者。

当然，要在中国大陆的学院中做学问，要能够对官方的“文革”定义说“不”，也得运用技巧。譬如他在定义中没有对“动乱论”作出正面的批评的时候，说到，如果“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的话，接着问：“一场‘内乱’为什么能够发动亿万群众真心诚意的参加，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全世界造成哪样巨大的影响？这又是‘内乱’的定义（注：为了不和中共中央唱公开的对台戏，他把‘动乱’说成是‘内乱’）不足以说清楚的，或者是包容不了的。”在发表了上述的意思之后，他认为“文化大革命”“自身却有迷人的神圣光环，有能够吸引人参加的号召力，有过去历次政治运动所不曾有过的一系列特点。”

如果说我们在上述的定义中发现作者有意要排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的意思，那么他好象已经多多少少地意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另一种性质；而这种性质如果又不被他安排在毛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框架之中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的民主性质似乎就游离在“非革命论”和“非内乱论”之间了。其所以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作者牢牢地抓住了“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人民群众”“真心诚意参加”的这一点，因此作者用反问的口气所发表的上述结论，已经把“动乱”这样的意义从运动中给剥离出来了。在大陆那样广袤的土地上，在同一个时间空间中都发生了同样性质的“动乱”，这无论是人们不能够想象的事实。就这个运动具有“迷人的神圣光环”这一点来说，作者虽然也暗示了毛的存在和作用，但是，他总是给这个众口一词曾经说到过的因素打上了一个疑问号，也正是在这里，我才怀疑作者是否已经对政治问题的“宗教化现象”产生出了独立的理解。至于说到“文化大革命”“有能够吸引人参加的号召力”问题，作者虽然没有给予详细的说，已经表现出来的思路是他把它当成了“人民运动”，在书中，他运用了比较多的笔墨描写了上海工人运动，也同时涉及到其它省区的一些重大的“人民群众的事件”就是证明。因此，在排除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同时，他好象有意要把运动安排在一个自治的人民运动的坐标上，尽管这个意图在书中是隐晦不明的，但是它存在于字的行间之中却是一个可以令人品味的东西。

#### 5、对共产党运动的否定

直到今天为止，许多中国人还把“文化大革命运动”看成是共产党运动，在中国民运人士的队伍中，持这种看法的人也不在少数，特别是在目前的以《大纪元》报开始的“全面声讨共产党的邪恶”的活动中，把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犯罪”的“最高记录”来对待已经变成了一种风气。这种风气除了表明鼓动风气的人对于共产党有着“深仇大恨”以外，似乎不能够再说明其它的问题。我作为民运人士（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合格不合格）并不反对上述风气，我认为这样的风气其所以能够形成，自然有它的原因，即使这样，我也没有对此风气就随声附和。我认为民运人士是政治人士，政治人士应该对政治问题持一种政治科学的

观点和立场，自然而然他们对政治问题应该有一个比一般的不是属于“政治”范畴的人的更为“专业”的看法，因此，这样的看法如果可以用“科学”二字概括的话，那么民主运动应该靠“科学”来指导的意思就等于排除了诸如“宗教”或者“气功”之类的指导作用。

在《史稿》中，金春明教授的“文化大革命的定义”就已经排除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共产党运动”的庸俗的流行见解。就最初的“设计”意义讲，“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政治运动，是“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进一步的“深入”，但是，在运动的实际展开中，因为存在在着“6个特殊”，所以，运动就偏离乃至完全脱离了共产党政治运动的“正常轨道”，虽然作者没有对它作出一个明确性质的判断，但是他已经判断出了这是一个“特殊”的以反对“共产党内的走资派”为名的反对共产党的运动。他非常坚定地指出：“与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同，‘文化大革命’不仅不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委领导下，依靠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进行的，反而在一开始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各级党委。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荒谬的口号下，从中央各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到基层党支部，都普遍受到冲击，都被夺了权。广大党员（除人民解放军系统外）也被停止了组织生活。”说到这里，他的话就嘎然而止，没有说到，“广大党员在停止了组织生活”之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竟然以“造反派头目”和“造反派战士”的身份开始过上了新的“政治造反”生活！

话已经说清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贯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运动的“特殊对象”，因此就运动的“对象特殊”（它是“6个特殊”中的第3个“特殊”）而言，这已经是正儿八经的反对共产党的运动了。但是，作者和我不一样，他是执教鞭的人，所以，他在“反对共产党”的句子的后面缀上了一个“各级党委”的词尾，听起来就不那么的尖锐了；而我在1974年写作的《绝妙的戏》的书稿中，就直截了当的说“这是一场反对共产党的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难怪我的书出版不了，“只能够压在箱子底供老鼠的牙齿的批判”（马克思语）。

## 6、人民运动——口欲言而啜嚅

在一个如此之冗长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定义中，金教授排除了“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运动和共产党运动的两种说法，认为它既不是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也不是邓小平等人所指责的“动乱”，但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他却并没有说出，用“6个特殊”的障眼法企图瞒过读者们的眼目，大有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章法，不愧为中国的大手笔！我没有见过金教授的面，对他的年龄和生平都一无所知，所以我没有办法知道他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竟然是个什么样子？他的书，我在阅读的时候也是“不求甚解”，只是在今天，当我个人感觉到发生于39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总源头的时候，本着临时抱佛脚的方法就写作了这篇文章，也不知道身在中国的金教授能不能看到它。

我的直觉告诉我：金教授可能想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民群众的政治运动，但是，这样的话具有“犯禁”的嫌疑。所以他也就口欲言而啜嚅了。情况尽管如此，他对一个非常“禁忌”的领域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而这样的见解随时都有撞上“政治高压线”的危险也无所顾及——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2005-08-02

~~~~~

【一家之言】

“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

• 金春明 •

1996年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爆发30周年，结束20周年。西方和中国香港及台湾，由于某些研究者的努力特别是传媒的有意渲染，出现一小股“文革”热。祖国大陆也发表了一些研究“文革”的著作和文章，也开过一些小型的主要由学者参加的研讨会，但一般民众知之者甚少。现已尘埃落地。回顾这一波的研讨，似可以说，新观点、新材料、新成果并不为多。但其中也有颇为引人注目的新提法，那就是“两个文革说”。关于这种新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徐友渔曾作如下概括：

“在纪念文革发动30周年的研究和讨论中，‘两个文革’说是讨论最集中、争论最热烈的话题。”

“‘两个文革’说脱胎于‘社会冲突论’——这是海外中外研究者关于文革研究的一种方法和理论。西方学者李鸿永、陈佩华、安德佳、骆思典、怀特和白霖等人主张，研究文革不应集中或局限于研究中央领导人之间的路线斗争、政策分歧或权力斗争，还应该研究群众的行为，他们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杨小凯、郑义、刘国凯、王绍光等人也持‘社会冲突论’的观点，杨和郑以及王希哲明确提出：有两个文革，一个是上层的权力斗争，另一个是下层的群众斗争，是群众利用文革之机反官僚，反特权，争取自己的利益。”

“两个文革说”既然已经成为海外“讨论最集中、争论最热烈的话题”，那么大陆的“文革”史研究者也不应该漠然置之。

—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不同人讲的“两个文革”内容是有区别的。概而言之，似可分为两大类：即一类是偏重把“文革”按不同的社会群体进行分类研究。例如把社会的上层和下层，领导和群众，工人和农民，“造反派”和“保守派”，“红五类”和“黑五类”等等加以区分，认为他们参加“文革”有不同的动机，不同的表现，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利益等。这种观点无疑有其合理性，也是“文革”史的进一步研究所需要的。在过去“文革”史的研究中，确有重视领导而忽略群众，重视决策而忽略实践，对不同层面的群体研究不够等缺欠。另一类则偏重在对待共产党的不同态度方面，把“文革”分为毛泽东的“文革”和人民的“文革”两种，认为前者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权力斗争，而后者则是人民大众反抗共产党“暴政”的“人民起义”。这种观点中最具代表性又说得最明白的莫过于现在国外的民运分子、作家郑义了。他在香港出版的《开放》杂志1996年5月号发表文章说：“一个是毛泽东老谋深算地利用人民夺回最高权力的权力斗争；一个是人民不自觉地利用毛泽东的权谋反抗中共专制暴政的民主斗争。”这就是他认定的“两个文革”。而从第二个“文革”的意义上说，他“宁愿把人民的反抗视为中国当代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反抗共产暴政的人民起义”。

这后一种观点，实际上对于“文化大革命”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十分尖锐而又具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即：“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干什么的，如何准确地给它定性？在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中，是存在着一个“文革”还是两个“文革”？如何认识“文革”中名目繁多的各类群众组织，它们同中国共产党、同党的领袖毛泽东到底是何种关系？那10年中客观存在着的不同形式的反抗斗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正义斗争还是“反抗共产暴政的人民起义”？如此等等。很显然，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必须搞清楚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判断，必然引向不同的研究方向。所以，本文要着重评析的是第二种“两个文革”说，对第一种只能顺便涉及。

二

要评析“两个文革说”，首先需要弄清楚“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即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掀起翻天巨浪，搅得8亿中国人不得安宁，使一部分人颠沛流离、甚至家破人亡的那场大风暴，到底是何方神圣？这一直是一个引人注目、发人深思的大问题。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论断，是得到大多数人赞成的权威性的说法。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从事物发展的客观结果看，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它对当时已经提出的“反帝反修说”、“群众反官僚主义说”、“上层权力斗争说”、“反革命宫廷政变说”等等，均是一个有相当说服力的回答。

但是，正如任何一个定义都不能概括复杂事物的各个侧面一样，“内乱”的定义也难以满足“文革”史研究逐步深入的需要。“内乱”是一个中性词，只是表述了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现象，而不能明确表述这种现象的性质和特点。比如中国历史上有所谓“安史之乱”，它是藩镇强大之后向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夺权；又有所谓“八王之乱”，则是最高统治家族内部的一种权力之争；又有所谓“洪杨之乱”，则是农民起义造封建统治者之反的革命性斗争。而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内乱同“文化大革命”虽然可能有某些类似点，但从根本上考察，是有本质区别的。起草《历史决议》时可能已经考虑到这一点，所以特别给它加上“由领导者错误发动”和“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两个定语，这当然是很必要的。但它依然难以回答一个关键性问题，即：领导者为什么要错误发动、发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要干什么？因为这场运动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发动这场运动的恰恰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最高又富有政治经验的领袖。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很有必要对“内乱”的总定义作一些不同侧面的补充。

近年来，颇有一些研究者把“文化大革命”同建国以来持续不断的各项政治运动联系起来，认为“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特殊的政治运动。比较集中地阐述这种观点的是199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该书的前言中说：“文化大革命”是由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以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为革命对象的，采取“四大”方法动员亿万群众参与的，以反修防修巩固红色江山为神圣目标的一场矛盾错综复杂的大规模的长时期的特殊政治运动。给“文化大革命”作这样一种界说有什么好处呢？第一，有助于说明“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来龙去脉。因为“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平地生风的，而是1957年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各项政治运动的总汇和最高潮。正是那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为“文化大革命”作了充分的政治、理论和思想准备。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那些政治运动不断发展的恶性循环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第二，可以更好地显示“文化大革命”本身的特点，显示它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内乱的独特性。例如特殊的领导，特殊的理论，特殊的目标，特殊的对象，特殊的方式，特大的规模，特长的时间等等。第三，有益于帮助我们分析和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繁纷复杂的事物和事件。一篇文章说：“文革是对人在平时很难受到的测试的各种限度的测试……不同身分、不同年龄段的好几亿人同时投入这一测试之中，这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观”（注：《焦点》杂志，1996年7月号，第33页。）。从这个角度观察，不少“文革”中发生的奇异现象和怪事就容易理解了。

有人认为这样的界说是对党的《历史决议》的“偏离”。我认为不能因为文字表述的角度不同就作这样的论断。其实，从精神实质上看，把这种说法看作是对《历史决议》论断的一种补充，可能是更符合实际的。

三

“文化大革命”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空前规模的特殊政治运动。如果认为这样的界说能够成立的话，评析“两个文革说”就可能比较容易一些了。

第一，提供了可以比较的历史事件，这就是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这些运动的具体目标、运动方式、规模和延续时间是各不相同的，但在一些基本方面却是相似的。例如，都是由执政的共产党提出号召和发动的；运动的方针和目标都是由上边规定的；群众一般是响应党的号召，有组织地参加运动，虽然也有某些自主性，但一般不能超过领导规定的范围等等。像建国之初的土地改革运动，主要是在新解放区的农村进行；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主要是在城市的机关干部和大专院校的教职工及学生中进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主要是在县以上的党员干部中进行等等。“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也是规定在“五界”（即：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中进行，不过后来范围扩大了而已。

第二，共产党搞政治运动的特点是上下结合，动员广大群众参加。这既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方针决定的，又是党的领袖毛泽东所特别强调的。他认为要办成任何事情都必须大搞群众运动。因此，没有广大群众参加的政治运动是没有的，只是参加运动的群众有多大规模、达到何种广泛性和深入性有区别而已。有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参加的政治运动，在中国曾是很平常的事，有亿万群众参加的也不只“文化大革命”一次，像土地改革、“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有亿万群众参加的，不过时间没有那么长就是了。

第三，在过去的那个历史阶段中，群众是分阶级和阶层的，即使是同一阶层中也有社会地位、环境的不同，利益和要求也不会是一致的。成百万、上千万的人参加同一个政治运动，尽管他们可能呼喊着一个口号，念着同样的语录，但他们的动机和要求，他们的表现和行为也必然是千差万别的。这些因不同动机、要求产生的不同行动，虽然也会给运动打上或深或浅、或全局或局部的不同烙印，但都不能决定或改变运动的性质。例如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有的地方斗争激烈些，有的地方相对缓和些；有的地方打击面宽些，有的地方窄些；有的地方挖浮财多些，有的地方少些，如此等等，但都不能改变土地改革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再如，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运动，有的地区声势很大，火势很猛，有的地方相对势头弱些；有的地方认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多些，有些地方少些；有的领导干部很积极，也有的比较消极，甚至委婉地抵制并保护一些人等等。但这些均不能改变这次运动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打击了正确意见，造成了严重恶果的错误政治运动的基本性质。

以上三点对“文化大革命”也是适用的。首先，“文化大革命”是由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这是众所公认的历史事实。虽然党的具体领导方式同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同，“文革”初期流行“踢开党委闹革命”，大多数部门和各个地区的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确实有两年多的时间不能发挥领导作用，但共产党总体上的领导还是存在的。按照当时公认的说法：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所以，“文化大革命”从总体上说，并没有超出共产党的领导之外。其次，确实最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毛主席号召群众关心国家大事，也确实有亿万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规模空前。这和历次政治运动没有什么两样。而离开了这种空前规模的长时间的群众运动，也就没有了“文化大革命”的特色。再次，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存在着不同的动机，不同的利害，不同的要求。这方面比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表现得更明显、更突出。例如确实有人不赞成打倒“走资派”，不赞成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和那么多老干部；确实有人不赞成当时盛行的个人崇拜思潮；确实有人要求好好反一下当时已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等等。群众组织分为两大派，而且存在尖锐的对立以至发展为严重的武斗等等。但是，这些分歧和不同，并不能决定或改变“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这也是公认的客观事实。

有研究者认为：“是否构成另一场革命运动，这主要是对他们活动的自发性、独立性的判断。

如果群众的行为纯属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如果他们的要求大致可以纳入毛泽东关于‘文革’的理论、纲领之内，那么就谈不上第二个‘文革’”（注：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1996年8月号，第12页）。这样的分析判断标准，我认为是比较合适的。

四

这就是说，要弄清是否在那10年中神州大地上存在“两个文革”，关键是要看是否存在所谓的“反抗共产暴政的人民起义”。这里需要的是客观的确凿的史实，而不是基于政治偏见的耸人听闻的言词，也不是虚张声势、蛊惑人心的空洞结论。可惜，在这方面“两个文革”论者并没有也不可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

“两个文革”论者，特别强调的是“文革”当中的造反派，强调造反派组织的特殊意义。他们认为造反派组织“已具政党形态，组织结构与共产党类似，有宣传部、政治部、组织部”；“各省造反派已发展壮大成有权、有人、有钱、有枪、有地盘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统一体的实力集团”；“文革中积极造反的人都是市民中对共产党不满的人……这是一场真正的造反，共产党官僚十七年来干的所有事都受到市民的清算”，如此等等。不了解情况的西方人也许会相信这些论断，但对亲身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论断离开历史的真实太远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组织山头林立，数不胜数，可谓多矣。但要找出一个公开声明不拥护毛主席，不赞成“文化大革命”，要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并提出这方面的纲领要求的，则可以肯定地说，一个也没有。例如，北京的五个著名的大学造反派组织：“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地质学院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从名字看就是非常革命的。他们都极力标榜自己是“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中央文革的铁拳头”，宣称“誓死保卫”毛主席和红色江山，“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这哪里有一点反抗所谓“共产暴政”，“清算共党官僚”的味道呢？

那么，当时不被中央文革小组承认，被排斥打击，甚至被打成“保守组织”，以至“反动组织”的那些群众组织是否符合“两个文革”论者的反抗“暴政”的条件呢？也很难找到。比如说，曾被定性为“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五一六兵团”，在其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1967年7月11日）中说：“我们全体代表决心以中国共产党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力求在火线中在思想上首先加入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终生，直至生命最后一息”。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与反抗“暴政”有何相干？

再说大名鼎鼎的“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这个组织在1967年元月1日发表的《通告》中，也是公开号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而且“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个《通告》的问题大概就出在把毛泽东思想限定在“1960年以前”，而有悖于林彪、“四人帮”所极力鼓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

在武汉“七二〇事件”中被打成反动组织的“百万雄师”又怎么样呢？据一份名为《百万雄师联络站关于前一段工作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文件说：参加该联络站的57个革命群众组织的120多万人中，工人占48.14%，贫下中农占18.71%，红卫兵（学生）占19.12%，机关干部占5.07%，烈军属和街道居民占8.13%。其中共产党员占武汉市党员总数的85%。他们的实际活动又怎么样呢？当时，武汉军区曾称赞“百万雄师”有10大优点：1.大方向始终正确，矛头指向一小撮；2.最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贯彻《十六条》；3.对解放军始终信赖，用生命保卫解放军的安全；4.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5.能团结

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6. 有无产阶级纪律性；7. 坚持抓革命，促生产；8. 反对武斗，被迫自卫；9. 成员多数是老工人、老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0. 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拥护。从这样的群众组织身上哪里可以找到一点反抗所谓“暴政”的影子呢？

整个的群众组织反抗“暴政”难以找到，那么说某些人、某些“造反英雄”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总可以吧？回答也很难令“两个文革”论者满意。以中国之大，人员成分之复杂，有几个反共分子并不奇怪。问题在于说哪位“造反英雄”是反抗“暴政”的代表人物，从他们当时的实际表现看却很难找。我们不妨具体分析几位当时声名颇为显赫的著名造反派人物。

先说北京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的聂元梓。她是被毛主席称赞为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带头人，因毛泽东亲自批准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而声名远扬，一段时间里扶摇直上，不可一世，是新北大公社著名的“老佛爷”。她“对共产党不满”吗？否。她从小参加共产党，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在北京大学也是系的党总支书记。她不满的是，在四清运动中没有能在工作组的支持下扳倒校党委书记陆平，反而遭到了批评，因而对中共北京市委有气。她乘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机，在康生之妻曹轶欧的授意下揭竿而起，但这里没有任何“反共”的味道。

五大领袖当中的另一位蒯大富，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头头，又是影响很大的“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三司”）的司令。他造反前是一名年轻的大学生。他因反对有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参加的工作组被打击，又经周恩来出面给予平反，而成了“响的造反派”。他策划“智擒王光美”，开10万人大会批斗共和国主席夫人，率先奉命在北京举行大规模的反对共和国主席的示威游行，在天安门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轰动一时。他对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一直是忠心耿耿，指哪打哪。这样的人能说是“对共产党不满”吗？

还可例举一位更年轻的，当时的中学生，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发起人之一的卜大华。正是这个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亲笔回信，才使红卫兵运动风靡全国，掀起给全社会造成巨大震荡的风暴。后来，卜大华因“炮打中央文革”而一度被捕入狱。1968年到陕北插队，当了下乡知识青年。他曾有这样一段颇具代表性的回忆：“我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标，喊几句‘反修防修’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到了陕北农村，他感觉从“天上”落到“地上”，这才认识到搞“文化大革命”同“人民的愿望相差十万八千里”。

上面例举的三位都是知识分子，仅讲他们似不够全面，那么就再举一位农民和一位工人的著名造反派为例，这就是全国闻名、因造反而青云直上的陈永贵和王洪文。

陈永贵是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中带头造反的一位。他是真劳模，在大寨的艰苦创业中作过重要贡献。“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积极响应号召，不但夺了县的权，而且夺了省的权，成为省革委会里的实权人物。他从农村党支部书记一直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位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要找他“对共产党不满”的事实，从思想动机到实际行动，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他为什么造反呢？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打倒从县到省的走资派，铲除修正主义路线。

王洪文是“文化大革命”中由于造反而迅速飞升至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火箭式干部，是升得最高，官位最大的一个造反派代表人物。他为什么造反呢？因为确有不满意。他本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的干事，因“手脚不干净”而在四清运动中遭到批评，结果使这位抗美援朝转业的年青干部眼看到手的科长职位泡了汤。因而他胸怀不满，怒火中烧，乘“文化大革命”之机，在厂中第一个贴党委的大字报；又跑到社会上去搞串连，发起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

部”（简称“工总司”），当上司令，成为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的所谓工人领袖，为飞黄腾达打下了根基。但是，王洪文的这种不满，只是对工厂党组织不提拔他当科长的不满；他发泄不满的目的，还是向共产党要官当。这同“两个文革”论者所说的不满所谓“暴政”性质截然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这里，显然需要划清一条界限：对某些单位领导人的不满同对共产党整体领导的不满，对现实社会的某些体制和现象的不满同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不满，二者是有根本性区别的。二者是性质不同，不容混淆的两类事，这不但对研究者，即对普通人也是常识。

凡造反者总有对现实社会种种不满的理由，不管这些理由是什么。而不同的不满理由，也就决定他们造反的不同对象、方式和目标。例如，洪秀全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农民造反领袖。但他反对的只是清朝的皇帝，而非封建制度，虽然也草拟了《天朝田亩制度》，却不能贯彻实行。结果他领导建立的太平天国，并不能超越旧的封建制度，也不能救中国。中国共产党是现代中国的最伟大的造反者，但与洪秀全不同，它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因而它可以领导中国人民彻底废除旧制度，打碎旧世界，建立崭新的社会主义中国。

“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者，与上述造反者都不同。他们虽然也高喊“把旧世界砸个稀巴烂”，“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但造反的对象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所谓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造反的目标既非改朝换代，也非推翻国家政权和打倒共产党，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改变颜色”。这就决定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虽然调门很高昂，规模很宏大，声势很凶猛，代价很巨大，但所要达到的目标实在很有限。“文化大革命”中不管多么著名、多么活跃的“响的左派组织”，也只能在伟大领袖圈定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跨越雷池一步。

难道就没有一个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造反派组织吗？由于中国之大，也由于当时的群众组织名目繁多，形式庞杂，而至今尚缺乏充分周密的调查和系统深入的研究，我不敢作绝对的结论。但就我个人接触和了解的情况而言，在“文革”期间公开发表的各种造反派组织的成立宣言或纲领中，确实还没有发现以“反抗共产暴政”为目标的群众组织。无视这样的基本事实，而主观随意地夸大“文革”时期发生的某些个别事例，甚至歪曲或捏造个别所谓“史实”，企图用以改变已取得共识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性质的正确结论，是不可能为亿万“文革”亲历者接受的，也只能是徒劳的。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三点认识：

“文化大革命”只有一个，这就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有亿万群众参加的长达10年之久的特殊的政治运动。此其一。

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亿万群众，动机各不相同，行为千差万别，但总体上没有超出毛泽东划定的大框框，更没有人公开明确地提出任何独立于毛泽东的理论、方针之外的政治纲领和不同目标。此其二。

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始终存在着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反抗和斗争，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反抗和斗争，为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至随后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这种抗争成效显著，功不可没，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这种抗争与反抗所谓“暴政”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这种反抗斗争从本质上说，是党内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斗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左”倾错误的斗争。斗争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此其三。

总之，“文化大革命”的准确定性问题，是可以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导下，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而“两个文革说”则偏离了正确方向，违反了基本史实，是不足为训的。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北京 100091）

原载《党史研究》一九九八年三月

~~~~~

## 【难忘岁月】

### 《风雨人生路》摘载（之九）

• 刘文忠 •

#### “备战”挥“铁拳”

一九六九年八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毛泽东发出“要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说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在全国“战备”的非常日子里，无产阶级专政频频铁拳出击，加大加快了对“反革命分子”的无情镇压。一九七零年三月，那天我清早去厂里上班，路过徐家汇，看到一张“公判”海报。我对这种海报特别敏感，因为辉哥就是这样死的。我被海报上所写某月某日将公判一大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罪犯的名单紧紧吸引，上面赫然写着我曾蹲的一所302牢房3座胡懋峰的名字，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那最要好的知己牢友竟也上了“文革”阎王爷的录鬼簿？！我顿时惊吓恐怖，浑身冒冷汗。踏进工厂后，一边劳动一边在想与胡兄牢狱相处的那段日子里。他那彻底、大胆反“文革”的言论，他那机智、聪明对抗牢中看守们残暴的办法，他那时时刻关心我，临别时谆谆鼓励我“兄弟要活下去，活着就是胜利”的嘱咐，以及我们一起畅怀“口读”世界名著，直抒己见的“孙文读书会”……这样一位年轻的知识精英又要“上路”了，我想无论如何该去看看，给他“送别”。这天下午，我装着肚子疼，向监督小组请假。因为我从未请过假，而且从不计较早来晚归，所以容易准许。我骑着自行车拼命赶去文化广场。我没有入场券，只得等候在广场大门口，四点钟公判大会结束，高音喇叭狂呼口号“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押着死囚赴刑场的警车队缓缓开出会场大门。在第二辆敞篷卡车上，胡兄被五花大绑捆着，左右两个文攻武卫战士狠摁着他头，我看清胡兄拼命挣扎想抬起头来，但他喉咙口有一根麻绳死死勒紧着。他满脸冲血，根本无法呼喊出一句临死前的吼声。我骑着自行车追随行刑车队赶了一阵，胡兄显然无法看到我，我却见他脚上穿着我留给他的那双辉哥本来穿的皮鞋。我泪水禁不住刷刷流下，天啊天数啊！67年三月我辉哥遇难，70年三月胡兄前赴后继，而这双高帮皮鞋就是见证物。皮鞋不会开口，但它伴随两位青年思想者的足迹，一直走到了生命之光的尽头……。我追赶行刑车队到淮海路拐弯处，不料被大批的过街群众堵塞了前路，只得注目远送胡兄渐渐不见了影子。

“文革”中的公判镇压大会，有上万民众参加，会后又用敞篷车押解死刑犯沿途游街示众，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大显威风、大施威慑，杀鸡儆猴，压服民众的好办法。我看周围民众，有的惊恐不安，有的茫然迷惑，有的兴高采烈，而我自己却又想象到辉哥三年前同时同地同样被押赴刑场的情景，眼泪滚滚再也止不住了。身旁行人看我满脸泪水很奇疑，我慌乱飞快地踏着车轮离开人群。回家路上，我独自躲藏在肇嘉浜路绿化林子里痛哭了一场。痛定思痛，猛然想起，单凭胡兄原有罪行还不至于判死刑，是否牢里又出了什么事？他在牢里，尤其在我们“孙文读

书会”中所散布的极端言论，是否被人出卖告发？我心思重重，推着自行车缓步走回家。脑海中时浮现胡兄的面容，时现胡兄的背影，泣不成声地默默思念着。我反复咀嚼着胡兄生前的嘱托：“兄弟要活下去，要期望看到公道战胜邪恶的一天！”

### 情愿“二进宫”

1971年5月底，我正在厂里劳动。突然工宣队叫我到办公室，看到二个陌生人。工宣队头头介绍说，这是市公检法来的同志。来者用平缓口气告诉我，据单位领导介绍，我二年半在厂里改造基本还算老实，不然今天就抓我进去。原因是我在一所关押期间又犯下攻击文革等反动言论，现在给我一个机会“老实坦白交代”，否则随即带我进去，警车在厂门口等着……

说心里话，自从胡兄被处决后，我就有一种预感“可能又要出事”。因为单凭胡兄过去的罪行判不了杀头。既然公判海报上说他“坚持反动立场，在关押期继续与无产阶级专政为敌到底”，那说明有人做了“犹大”，出卖告密揭发了他，必定会牵连到我，我在一所与他关系最亲密，“孙文读书会”正是我俩秘密撑起来的。公检法来人与我一小时谈下来，我一口咬定不清楚又犯了什么罪，只知道我现在老实接受管制改造，绝乱说乱动。对他们软里带硬，威胁恐吓，再关我进去一说，我当即表示“无所谓，情愿进去。”他们始料不及，暗暗吃惊，想不到我如此“老练、顽固、死硬”，竟不怕再坐牢。他们俩与工宣队、厂革会头头到隔壁商量了半天，出来对我说：“给你好好考虑一星期，坦白交代就不一定进去，可以继续留在单位接受管制改造。”他们又实说：“坦白告诉你，单位在为你讲好话。”

市公检法人员走后，厂革会头头要我留下来，继续同我谈了一小时。他说：总体上群众反映我在管制的二年半中属于老实接受改造的，没有犯什么新罪行。他劝我不要自暴自弃。“公检法不是凭空吓唬你，他们确实掌握了你原来同监犯人检举你攻击文化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罪行，而且与你一起的那个主犯已判死刑了。你还是回家好好想想，在单位改造总比坐牢好。你坐牢在里面每天吃什么东西？能随意吃得鱼肉吗？能自由呼吸到新鲜空气吗？能看到蓝天白云吗？你在牢里那种生活我多少知道些，那种关押生活不好过。你还年轻，不要走你哥哥那条绝路。你若再进去，你老父母再受得了这种打击吗？……”这位厂革会头头显然在好心规劝我，不无一番苦口婆心的感人姿态。这天我边劳动边思想斗争激烈。

下班后回家，我一个人弯进肇嘉浜路街道花园里，蹲在树丛中苦思对策。我清楚知道，摆在自己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配合他们把一所期间所干的事彻底交代清楚，并所谓检举揭发他人立功赎罪，或许仍能留在厂里、社会上接受管制，个人行动稍为自由些；另一条路拒不交代，再关进一所加判几年徒刑。我前思后想，自66年11月26日至今，已经关押、管制近五年，我在单位管制中没犯过什么新罪，在一所曾讲的那些话，办过“读书会”，也并不是死罪行为，最多加判五年。监牢里面固然是地狱，在外面受管制也天天在遭油煎。这五年梦魇般的长长岁月，我心里流出的全是血和泪。我已经不是初入监的“阿瑟”了，深知坦白就是从严，还不如抗拒到底“二进宫”。

回到家中已夜深九点多，老母亲还在等我。我是母亲亲生的第九个孩子也是最小的儿子雨弟，从小得小儿麻痹症瘸了左脚，母亲总认为我婴儿十个月时发高烧她不当心造成我终身残废，内心愧疚了我什么，所以特别疼爱关心我。我进一所二年多，三姐把她接去陕西的日子里，母亲也是天天挂念、担心我。我出狱后，母亲怕我再出事，不放心，一直在盯牢我，反复告诫我：“你大姐大姐夫没有义务一定要收留你，出于无奈与怜悯，你如果再出事，那太对不起他们了，也使在外地关心你的哥哥姐姐们伤心绝望……”为此我绝不能把今天单位里发生的情况告诉她。深夜我悄悄给四川的四哥文正写了封信，大略告之我又出事了，是原来监牢中的事，并表示我打算再进去，这次进去可能遥遥无期，也可能再也出不来了。这时的我对“文革”的仇

恨与日俱增，深知我不管到哪里，反文革的观点与决心绝不动摇，绝不妥协，横下一条心的我不怕走辉哥的路。出狱二年半来受够了冷酷绝情的精神虐杀。对我这种“牛鬼”，东山老虎要吃我，西山猛狮也要吃我，监内监外一个样。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内心思想斗争好苦。我没有动笔写一个字“交代”，而反复考虑，不甘心轻易被他们再抓进去。“出逃”两字闪浮脑海，与其束手就擒，坐等入囚，不如想法逃出上海，独自悄悄远走高飞，到外地无人知晓我的乡僻山麓，或者干脆冒险一赌偷渡出境，因为在一所时我已从胡兄等人处学到了不少出逃偷渡的办法。但当我白天边劳动边思索策划好一切，夜晚回到家里，看到愁容满脸、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我又气馁了，下不了决心。我一想到刚回家时母亲、大姐与外甥对我诉说的恐怖记忆，告诉我与辉哥出事后家中所遭遇的巨大冲击，母亲差点被逼疯，我冷静再思，不能自私只求个人自由，而不顾母亲与大姐一家的牵连与打击。再说，我一出逃，在外地的几位哥姐一定又会倒霉，后果将不堪设想。

第五天是星期日，我照例去厂里监督劳动，厂革会头头值班，把我叫去办公室，告诉我，公检法来电话催问，“坦白交代”写得怎么样？我坦白地告诉他：“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我随时准备再进去。”他见我如此坚决回绝“从宽”之路，也没有再说什么。我当场向他提出一个要求：“转告公检法，抓我进去时最好在厂里，我坐牢东西都准备好了。我不愿让老母亲与小外甥们再次看到我被抓的情景。”他点点头，转身就给公检法打电话。当天本该是假日，我中午就回家。家住闵行的二姐带二个女儿来看父母。我准备向二姐摊牌，又想取得他们支持出逃，但扪心缺乏勇气，感到对亲属太残忍了，所以我强压住内心情绪像往日一样沉默不语。这天下午与几个大些的外甥讲些有趣的外国文学故事，明天他们的小舅舅命运又将起风波，但愿他们幼小心灵能忍受得了这个多灾多难大家庭引发的严酷打击。这天二姐多次问起我在单位情况，问我钱不够用，她知道我每月只有18元生活费，还得交部分给大姐母亲过日子用。在我读书时，二姐一直每月给我零用钱，现今受管制手头拮据向她要一点也是正常的。但我已决定不出逃，所以也不需要钱用，二姐关心地勉励我：“三年管制已过二年半，咬咬牙还有半年很快过去。”母亲与大姐都在旁附和“是啊！很快会好了。”他们哪里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怎么能给我这种人有太平生存的权利，像老父亲那样老实本分、软弱可欺的人，整整已被专了20多年政，整成了“木头人”一个，还是没有放过他。我对这点算是看透、看穿、看烂了心了！当夜睡觉前，我向白发苍苍、双目呆滞的父亲告别，叫他当心自己身体，在里弄不必太软弱，越软弱越遭人欺侮糟蹋，你快八十岁人了，那种掏阴沟、扫垃圾，做不动不要去硬做，他们奈何不了你。我把身上仅有的5元钱塞给了他。老父亲感到很突然，声音颤抖地问我，在单位怎么样？关照我“不要横竖横，争取好好活下去。”这一夜，我无法入眠，一合眼就见到辉哥，胡兄的身影，他们好象都劝我夤夜出逃，不要自投罗网……。蹲过大牢的人，都很怕监狱，而我当时却怀念监狱，认为监狱是学习的圣地，是清静灵魂的地方。

翌日清早，我悄悄整理了自己替换衣服，以及进牢需备的东西，打了个小包，并先将它藏在家门外，回身与母亲道别，偷偷看了母亲很久，心里难过之极。我想，如果今天进去后，单位来通告母亲，不知又会使她老人家急成什么样子？母亲似乎看出异常反态，奇怪地看着我，并轻声问“有什么事？”我说“没有”，并掉下一句“你自己保重”，转头冲出家门，拎起包裹，蹬上自行车飞快离去，双眼泪水不断涌流。这时天还刚刚亮，我长叹声声，老天啊！我真对不起老父亲啊！社会无边，人海茫茫，却容不得我残疾的刘文忠苟生一角，只有提着衣裤小包进监牢！

这天工作我心不在焉，差一点把自己手指在自动冲床上冲掉。中午十一点，厂革会派人叫我不要工作了，坐在牛棚好好再考虑一下。牛棚中其它人感到奇怪，个个惊疑莫名。午饭时我去食堂堂而皇之地拿出剩下的全部饭菜票，叫着要买不少最好的菜肴。食堂人员想起对我的“约法三章”，立即向厂领导汇报。革委会头头已知道我用意，干脆对食堂人员说“他要买多少就给

多少。”我开玩笑的对他们说：“最后的晚餐，拜托！”我美美地开怀品味这顿有肉有鱼有多种蔬菜的中饭，并慷慨地对“牛棚”朋友说：“今天我请客，独自吃不了这么多，大家一起尝尝。”老陈与梁大姐看了惊疑地说：“小刘今天怎么啦？这样大方，这个月不要过日子，饭菜票都吃光？”我有意笑笑，沉重地回答：“这可能是我与你们相聚的最后一顿饭。”他们连声惊问“什么事？”我摇摇头，叹口气说：“下午你们就知道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下午一点，工宣队、厂革会派了两个人来监视我。二点不到，一辆警车鸣叫着开进工厂，引起许多车间工人停工出来围观。上次来的两个人进了牛棚，他们见我毫不在乎，镇定自觉地伸出双手，让他们铐上手铐。我对这副冰冷的东西熟悉若友，自66年11月26日深夜起，在牢里不知戴过多少次！我把手里拿着已写好给母亲的一张纸条交给厂领导，对他说：“谢谢你们交给我母亲，我骑的一辆自行车请交给我家属。”我在给母亲的纸条上写得很简单：“母亲，儿子实在不孝，太对不起你，请你原谅。”

围观的工人群众顿时议论轰然了：

“小刘又出事了，又进去了！”

“他胆子真大，你们看，他一点也不怕，行李都准备好了！”

“这家伙太反动了，在工厂里装得老实，一点看不出。”

“我早知道刘文忠还要出事。他平时一声不响，肚子里全是恨，看人眼光阴沉。这次不知又干了什么反革命勾当。这家伙学他阿哥，不可救药！”

人们说长道短、肆意抨击，句句飘进我双耳。戴着手铐的我全然不顾，只当耳边风，抬头最后一次深情地看了看艰苦改造过我的工厂，环视围绕着或指责或猜测我这个向来被领导称“好小囚”现今变成反革命并再次拘捕的人群，然后昂首跨步走到警车边。公安战士为了不给我这个反革命镇定自若的表现，凶狠地摁下我的头，训斥我：“老实点，你嚣张，进去有你苦头吃！”用力地把我一推，塞进了警车。“胡……呜……！”警笛凄厉响起，我又被关押进了上海市第一看守所。

### 旧地来重游

公安警车驰进第一看守所大门，我被推下车。六月初的上海今年热得早，下午已是骄阳似火，戴着手铐的我汗流浹背，不需要押送人员的推搡，自己虽因脚残迈着歪步，但熟门熟路地穿过警卫室，踏进二重门。押送人员对负责收容登记人说：“这家伙顽固得很，好日子不要过，偏要来找死！有没有单间关他？‘二进宫’的。”

“刘文忠！”登记人员写下我姓名，不由好奇，“咦，怎么又进来了？”他是个老看守，二年半前我在这里见过他，好象是个训导员什么的，现今在造反了的一所内沦为登记员了。他看着我残疾的左腿，又从头到脚麻利搜索一遍，“身子比出去时胖壮了许多，在外面养得好好的，怎么吵着自动要进来？一所‘二进宫’的人不多见……”我给他奚落的又好气又好笑，心想“鬼不上门，人会来地狱吗？！”他几句阴阳怪气的数说，引起进出的几位老看守的注意，他们都从残疾左腿的“特殊标志”上认出了我这个年轻的“老囚犯”，有的嘟囔着“这年头，年轻人……”“‘二进宫’单间……”一位陌生的看守（可能算头头）说了此话，摊摊双手摇摇头，同另一位耳语几句。随即我被他们带进底楼的108号牢房。

我踏进牢房门，看见里面已有二个老年犯人，投来惊疑的目光。这说明现今一所与昔日大不同。由于社会上“反革命分子”层出不穷，这里已关不胜关，早就没有单间牢房让我“享受”了，无怪乎刚才那位“摊摊手摇摇头”，就是这个意思。旧地重游的我，迅速自我安排好座位，把带来的生活用品按牢中规矩一一放置妥当。我太熟悉这里的规则、条例与生活习惯了，不慌

不忙，好似到了家里那样，老练的程度使那二位老犯人吃了一惊。我笃悠悠地拿出带来的毛巾，浸着冷水给自己擦脸揩汗，然后镇定自若的席地而坐，闭目养神。二位被惊呆了的老犯人看着我若无其事的爽快动作，他俩相互对视默语。牢房里寂静异常，与我在厂里马达轰响、人声杂糟、时有专政队员到身边训斥等对照，犹似远隔天壤了。这时门外响起“开饭”叫声，我赶紧起身，贴近牢门小框洞边，准确地盛接监饭。接着，我把所得的牢饭三口作二口，狼吞虎咽地扒个精光，吃完还嘬嘬嘴巴，故意逼出个半饥半饱的喉呃。一碗粗糙黄粳米饭加点烂青菜皮、几根干丝，权当晚饭刚落肚，我想打破牢房沉闷，主动与两位老犯人攀谈，正欲动嘴开口，门外看守叫喊我“提审”。对此我迫不得已，正要听听审讯员到底掌握了我的什么“罪证”，看着他们如何故伎重演。

我被押到了审讯室，自觉地蹲进那只关坐犯人的连地黑漆审讯椅。我端坐抬头，借着耀眼光，瞪着审讯席上，以前都是二位审讯员加配一个书记员，今夜却只有一个中年审讯员与一个年青女记录。我想，二年半不来，这里“节约闹革命”，连审讯员也节省一个了。转念猜测，也许他们以为我“二进宫”，“人证物证”早已齐全，只需一个审讯员简单同我对证一下，就可以叫我签字认罪，草草收场……。正当我胡思乱想时，中年审讯员开腔了，态度并不严厉：“听说你要求进来，准备好行李自动‘二进宫’，知罪、服罪的态度还是好的。你既然是老犯人，我也不必兜圈子，趁这给你坦白从宽的机会，老老实实把自己当年在牢房里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的新罪行坦白交代。”

沉默片刻。年青女记录把他的开场白刷刷记录完毕，也抬头看我坦白表现，我却听而不闻，仍然眼瞪瞪地对视着他们。因为我早已打定主意，到了审讯室，只带耳朵，不动嘴巴，且听他们如何“启发”恫吓我。

“讲啊！耳朵聋了？嘴巴哑了？”中年审讯员表现不耐烦了，喉咙胖起来，声调提高八度。谁知我依然故我，只当没听见。且见他无奈地翻了案卷，抽出几页来，粗声粗气地指点着训斥道：“当时你同牢房犯人纷纷检举揭发，反革命顽固分子胡懋峰罪魁祸首，组织了反动的读书会，带头疯狂攻击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你竟然处处附和他，也是起劲地恶毒攻击。胡懋峰已被枪决镇压，你难道要步他后尘，走他同样的绝路吗？”说完双目射出了两道凶狠的眼光。

一提到当年患难共处的胡兄，我心头一阵伤痛，愤恨同牢房哪个叛徒犹大竟敢如此伤人害命卑劣事！我想是表明自己态度立场的时刻了，昂首大声说道：“我刘文忠老老实实在单位接受管制改造，根本不清楚为什么好好的再一次把我抓进来。你们所谓二年前一所发生的牢房内‘攻击文化大革命’案件，同我毫无关系，我根本没有这种新罪行。你们认为有，并相信那些造谣中伤的卑劣小人，就叫他们来当面对质！”我估计胡兄铮铮铁骨，绝不会出卖我；而那几个检举揭发的人，多数是“文革”造反派中的“现反”，他们钻营投机，靠出卖朋友立功后早已放出去了，怎能再来对质呢？我死抱着胡兄告诉我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一口不认帐。果然，审讯员给我这一番顺理成章的反驳而目瞪口呆，他似乎想不到面对这样一个老手，竟然无奈于我。

“当面对质？！”审讯员拍打着案卷，喉咙响得八丈高，“这批有名有姓、大量揭发的材料，就是最好的铁证！你这般死硬抵赖，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是不会吃素的！”他气势汹汹地蹦立起来，伸长右臂直指我面孔，怒火暴吼的腔调，似乎要伸手过来挖我眼珠。我不禁一吓地转侧了头，同时斜眼冷对，嘴巴紧紧咬定喘粗气。这时那个押带我的看守快步上来，双手像把大铁钳挟住我头脑，狠狠地扭转直面，又用力死揪我头一下，并训斥我“老实面对审讯！”

面对泰山压顶般的暴虐凌辱，我本能地发出“横下一条命”的看家绝招，故意将喉咙响得比他们还高：“我没有，根本没有犯新罪行！根本不记得二年半前在牢房里干的什么事情！你们‘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已什么都被你们剥夺了，有的只有一条命！你们说有，可以判我刑；

你们说有，可以枪毙我！我横竖横是个死！”

中年审讯员听了 I 同样声嘶力竭的吼叫，反而微微吃惊，不由自主地落坐了。年青女记录员竟停笔抬头望了望我，眼中不无惊疑神色。他们见我不怕坐牢，不怕判刑，横命一条，顿时审讯室沉寂下来，死气沉沉一般的恐怖。我说完后闭嘴闭目，任凭他们如何。审讯员只得下令收场，我被押回牢房。

第二天下午，我又被押到审讯室，同样是昨夜那个中年审讯员，开始他口气算缓和，讲了几句“不要死赖硬顶，只会罪加一等”的话，假惺惺表示“政府还是区别对待的，要挽救你。”我照样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自顾自端坐养神。审讯员一连宣读了几份检举揭发材料，说什么我说过“文革是祸国殃民”，说过“要为辉哥报仇”，又“恶毒攻击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光辉理论”……。审讯员一再逼问我犯罪经过，读书会的情况，还有什么人一起参与策划攻击。我却双耳听进，双目直瞪，闭嘴不言，“一问三不知”。中年提审员眼看自己像对着一根木头说话，气得他后来拍台拍凳，又暴跳如雷，我仍是“巍然不动”。连那个年青女记录员也气得涨红了脸，因为没有一句犯人供词可记录，对她来说似乎失了业，怎向领导交代呢？

在我绝口拒绝交代，审讯僵局无法打破的尴尬情势下，审讯员最后只说：“不管你认罪不认罪，交代不交代，铁证如山，岂容抵赖，照样判定你的罪行！”

说句后话，从此我在一所又关了一年零二个月，再也没有来提审我一次。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             |          |

---